

教育前沿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释放教育活力

杨东平

建立“升级版”中师制度,解决农村教师培养困境;成立“微型学校联盟”,实现内部教育资源共享;减少大班额,化解城“挤”乡“空”难题;设计“e农计划”,吸引留守儿童父母返乡;调动“新乡贤”等乡土资源,支持教育发展……来自地方政府的变革和创新实践,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中央政策“落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教育改革充满活力。

编者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变革和创新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地方政府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直接面对第一线的各种问题。中央的政策能否因地制宜地实施、把好事办好,教育改革的理想、目标能否落地,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活力。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日趋活跃,并呈现出一些可以认识的新特点。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管办评分离成为亮点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政府简政放权,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山东省青岛市为了满足市民对优质、多元教育的需求,政府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实现政府由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转变,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全面推行学校管理权限清单制度,将副校长聘任、内部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聘任、财政经费预算管理等、内部分配、招生等14方面的管理权限全面落实和下放给学校。同时注重依法行政,研究制定《青岛市中小学管理办法》。

在向学生下放主权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校长向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让渡权利,在全市中小学建立了家长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并逐步建立了教师、家长、学生、社区代表和专家共同参与的学校治理机制。

重庆市綦江区推进学区自治,成立由辖区内街镇领导、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社会知名人士、家长等方面代表组成的学区教育自治委员会。下设监督评价小组、学区业务自治组、学区自治执行组等工作小组,对学校办学进行监督评价,针对监督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研讨解决方案,督促学校整改问题,解决学校办学难题。打破校际资源壁垒,形成学区内教育资源的聚集效应。通过社区参与、街镇联动,形成教育合力,群众的教育满意度不断提升。用大教育观推动教育的大治。

教育探究

大约十年前,在一次国际大学校长论坛上,当国内一位研究者问国外大学校长,如何既能做好行政工作,又能兼顾自己的专业研究时,场内一时沉默了。这时,英国巴斯大学时任校长拿起话筒,站起身来说:我有一个好主意。说到这里,她笑了,整个会场都注意地倾听。她接着一字一顿地说:那就是,一天24个小时不睡觉,白天黑夜连轴转。

当时,会场内发出一阵善意的、无奈的笑声。这个像个小幽默,但道出了高校一个特殊人群的工作窘境。在国内,人们用“双肩挑”来描述这个人群。

高校“双肩挑”人员是高校中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2000年以来,高校人事管理精细化及其薪酬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双肩挑”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越来越引人关注,有的甚至成为舆论的热点、焦点。“双肩挑”的工作状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对高校“双肩挑”人员应当做到精准管理。

以问题为导向,制定“双肩挑”人员管理办法。有据可查,照章办事,是依法治校的基本要

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高校,“双肩挑”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是不一样的,有的目标定位不清,有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问题突出,有的工作中的公正公平性受到质疑,有的人员素质能力与工作岗位不相适应等。当前,由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普遍适用的“双肩挑”人员管理办法,是合理可行的。

以目标为导向,准确界定“双肩挑”人员范围。不论人员的行政职级高低与专业技术职务高低,也不论这类人员是否签订双重岗位合同,在高校中只要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都是“双肩挑”人员,这是广义的界定;其次,对人员的行政职级或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两者同时作出限制的,如高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理格局,撬动了原有条块分割的体制,在政府和学校之间搭建一个缓冲地带,形成了一套新的机制和模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示范。

寻求整体解决方案, 破解农村教育突出问题

在地方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整体性的重要创新案例,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困扰农村教育的老大难问题。

江西省弋阳县通过办好农村学校,规范城区学校招生,促进农村学生回流,有效减少了城区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化解城“挤”乡“空”难题。2015年与2012年相比,乡村学校学生数量增加了9400人,增幅为30.68%,留守儿童比例下降2800余名父母重新回到孩子身边。与此同时,改变了对农村学校的升学率评价,主要考核辍学率,和后20%学生的成绩,弋阳县的初中辍学率明显降低,初中三年巩固率提高6.34%。同时,注重学校文化建设,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成立乡村教育促进会,家校委员会,增强家校联系,在学校和村民互动过程中,有效改善了地方教育生态,在乡村文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省上栗县、河南省内乡县等地同样通过强基固本,办好农民家门口的学校,有效消减了城区大班额现象。

四川省阆中市利用乡土资源改善校园文化,实施朴素而幸福的教育。校园建设杜绝大拆大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加固维修后青瓦白墙的老建筑,朴素清爽,别具乡土特色。师生们用各种土办法装饰和美化校园,例如在教室、寝室的门上绘画,用学生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装饰校园,让校园洋溢着乡土文化的活力。秉持“生活教育”的理念,通过书香校园建设、劳动实践基地建设、积极研发乡土化、生活化的校本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实施有根的素质教育。为乡村教师改善居住和生活环境,在绩效工资、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使乡村教师能够在优美的校园中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为农村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提供了保障。

乡村教师待遇较低,是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湖南省泸溪县实行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采取倾斜政策激励乡村教师,采取倾斜政策激励乡村教师,中心校教师的岗位津贴每月500元,而村小、教学点为1200元;村小教师一年比城里教师多1.44万元。此外,采取教师资格评审向农村教师倾斜、建设农村教师廉租房等措施,有效地改善了乡村教师待遇。2009年以来,有265名教师自愿去农村学校任教。

如何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湖南省实施“农村小学教师专项培养计划”,定向、免费、精准培养能够在农村小学安心工作的优秀师资。包括高中起点的四年制本科、初中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初中起点的六年制本科三种免费师范生的学制。毕业生实行县来县去、县来乡去、乡来乡去、乡来县去四类计划,目前已累计招生3.62万余人,毕业1.05万余人,99%已补充到乡村学校。这些定向师范生基本功扎实,素质全面,心态稳定,受到基层的高度好评。这一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师”消失之后农村教师的培养困境,堪称“中师”制度的升级版。

教师编制问题是困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另一个瓶颈。山东省通过顶层设计,成功地突破了

怎样释放“双肩挑”的活力

丁巧丹

高校“双肩挑”人员是高校中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2000年以来,高校人事管理精细化及其薪酬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双肩挑”人员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越来越引人关注,有的甚至成为舆论的热点、焦点。

务者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称为“双肩挑”人员,这是中间意义上的界定,再其次,如果要求这类人员同时与所在高校签订行政管理岗位合同(或有任职文件)和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合同,这是狭义上的界定。把“双肩挑”人员改称为“双肩挑”干部、“双肩挑”教师、“双肩挑”岗位是不够精准的,这些称法分别指以行政管理为主、“双肩挑”人员,以专业技术工作为主的“双肩挑”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所在岗位。实践中往往先设定行政管理岗位,再聘任人员,然后根据受聘任者是否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来决定该项是否“双肩挑”。所以,聘任行政管理岗位人员时应慎重观测并合理配置“双肩挑”人员。

以激励为导向,合理统筹“双肩挑”人员薪酬。在“双肩挑”人员的薪酬方面,主要是奖励性绩



在教育的 田野 上耕耘未来。 CFP供图

这一制度瓶颈,从整体上解决教师编制问题。该省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并向规模较小的农村学校倾斜。对学生数达不到标准班额数的学校,按班师比配备教师;小学每班2.4名、初中每班3.7名。同时,增加编制弹性,实行提前编制和灵活编制。2016年6月,山东省已经完成中小学教师重新核编,乡村学校按班师比核增3.76万名,全省共计增加教师编制约10万名。

打破封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教育

在一些农村地区,地方政府采取不同方式增强教育的开放性。甘肃、贵州、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积极与公益组织、专业机构、高校开展广泛合作,鼓励多方参与,以补充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甘肃省宕昌县是甘肃省最后一个通过“普九”验收的县,近年来教育质量明显上升。其主要路径是借助专业化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自2006年起,宕昌县与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以推进新课程改革为主的中小学教师培训。2011年引进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教学试验项目,依托多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促进自主学习,实现课堂教学的根本性变革。十年时间,宕昌县教师教研体系从无到有,建立了包括语文、阅读、英语、学前教育等学科本土化的四级教研体系,扎实推进教师培训,开展校本教研。宕昌县已

经形成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成熟经验,目前活跃着14个提供各种教育支持和服务的公益组织。湖北省鹤峰县政府主动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民间力量为杠杆,找到行政管理规律、社会组织运作规律之间的有效结合点,打通公益事业与政府公共服务的界限,创新社会管理模式。2011年,全县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最早推广“免费午餐计划”,解决近万名留守儿童的基本温饱问题。此后,又在率先实施“政府部门+基金会+商业保险+三方合作的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模式”。2016年,鹤峰县政府与浙江省益农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展“e农计划”,旨在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返乡,从商业角度解决公益问题。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社会参与和社区参与,调动“新乡贤”等本土资源,支持教育发展。郧西县是湖北省财力最弱的国家级山区贫困县,为解决教育资源投入不足问题,变政府包揽办学为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充分动员本地“乡贤”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捐助助学。采取将有奉献精神的成功人士聘为小学名誉校长,授予冠名权,建立教育基金会等不同方法,构建捐助助学长效机制。两年来,共争取社会捐赠5496.5万元,捐赠总数超过学校标准化建设总投入的20%,为改善乡村教育内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学校和教师的自组织也是值得重视和发掘的内源性力量,能够产生导致改变的合力。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组织的农村

小微学校联盟,开始是小规模学校的抱团取暖,自主解决一些已成燃眉之急的共性问题,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开展课程改革和“互联网+教育”的教学创新组织。河南省濮阳县扶持了多个学校发展共同体和教师成长自组织,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共同体。濮阳县微型学校联盟,联盟内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开展“一专多能”的教师培训,通过教师走教,弥补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缺编问题。联盟的建立让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学校受到了关注,切实提升了教育质量。

以上的改革案例,有些已经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整体性意义,如省域内免费定向师范生的培养、解决教师编制的探索等,是一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的举措。弋阳县和阆中市的改革同样具有整体性意义,在城乡一体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视野中,在农村学校布局、促进教育公平、改变教育评价、密切家校关系、提升教育品质等各方面均有建树。特别重要的是,在那里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改变了学校的“孤岛”状态,从而真正建立了现代教育的现代性。这种“农村领先”的局部态势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如同一些农村学校的课改实践、浙江安吉县的幼儿园课程建设,不仅为改善农村教育提供了经验,也为改变城市的应试教育提供了方向。这些地方教育创新的实践,使我们增强了信心。(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一家之言

思想品德教学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合拍共振”

高鹏

“超越保护主义”认为,信息化社会中的学生在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媒介认知体验。教师应从学生已知的东西入手,引导他们辨别、分析媒介文本。

随着媒介传播形态的不断丰富,中小学生的生活日益生活在媒体世界中,其道德养成时受到各种媒介的影响。因此,媒介素养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成为中学生健康成长所应具备的重要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全面的信息鉴赏、批判和加工能力,并形成良好的审美表达和道德素养为根本追求目标。这一目标与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有一定的相似性,两种教育若能合拍并产生共振,必将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而这需要思想品德教师在“渗透”和“融合”上做足功课。

思想品德课程资源是渗透和融合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媒介。《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版)》要求“尽量组合不同类型的资源,将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等结合起来,使学生深入理解课程内容”。此外所指的“文本资源”包括了书籍(涵盖教材)、报纸、杂志、图表等,音像资源包括电视节目录像、各类教育软件等,实物资源则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自然和人文景观等。显然,这些课程资源也大多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载体。媒介素养教育如果以教师有选择的思想品德教学资源为资源,以教师有针对性的思想品德教学为载体,不仅可以取得道德养成、媒介素养养成等多种教学效果。

思想品德教师是渗透和融合媒介素养教育的能动力量。在英、美等国,媒介素养教育在发展之初是被一些有远见的英文教师率先引入课堂的。教师是学生信息技术的直接传播者,教师媒介素养的高低,在教育活动中对所接触的媒介的看法以及他们所引用的媒介信息等,都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媒介的兴趣和辨别。

思想品德综合实践活动是渗透和融合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平台。《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版)》规定,思想品德课程内容要有综合实践活动的项目。思想品德教学中的综合实践活动强调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通过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来自主解决问题,强调师生可以自主选择或设计课题来开展活动等,这些使得综合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思想品德课程及其教学,而是可以超越教材文本的框架,将问题及其研究延伸至生活实践中。这种学习方式与当下“超越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是不谋而合的。超越保护主义认为,信息化社会中的学生在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媒介认知体验。教师应从学生已知的东西入手,引导他们辨别、分析媒介文本;教师不是要告诉学生确定的事实,而是鼓励学生对学生信息进行质疑,学生则通过收集信息、与他人共享观点、反思各自的体验等来培养对媒介和媒介信息的批判性认识。因此,教师可以将思想品德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平台,通过设计不同的探究课题开展多专题、多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反过来,这种多专题、多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也会对思想品德教学起到一定的丰富和推动作用。(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中学)